

红旗飘飘

22

中国青年出版社



红旗飘飘 (22集)

本社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10.5印张 230千字

1981年4月北京第1版 198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3,000 定价0.80元



目 次

古城斗“胡骑”	王超北	1
军火库的红光	刘也兵	43
重庆来的秘密客	刘友谅	80
虎穴救战友	李荣胜	90
单刀赴会	何庆宇	112
板本一太郎	章伟文	126
两千五百两黄金事件	浦 作	147
江南柳	伍云甫	162
地下交通线上的日日夜夜	姚明达	172
重庆《商务日报》争夺战	梁森人	185
从《展望》到《地下文萃》	王元化	204
华中局城工部三年	张承宗	216
火种	刘奎 口述 春江 整理	230
皖南突围记	蔡 园	284
潜入芜湖之后	后文洙	307
血洒皖南——吕辉的故事	查汝申	317
封面画：红岩	沈加蔚作	



古城斗“胡骑”

王超北

编者按：王超北同志这篇回忆录，一九六二年曾以庞智笔名在本刊第十七集上发表。书出版后，康生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罗织罪名，说这篇回忆录是“美化叛徒”，“用回忆录进行反党”活动，诬陷作者是“叛徒”、“特务”，将作者逮捕入狱，同时严令将《红旗飘飘》十七集全部收回，禁止发行，并对有关编辑人员进行了政治审查。后来，《红旗飘飘》因此停刊。现征得作者同意，特将这篇回忆录重新发表。为了保持文章的原来面貌，内容未作改动，只将作者笔名庞智改为真名王超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十月间平型关大捷，港澳同胞为八路军捐献了一批慰劳品。1938年夏天，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派我去香港抢运这一批物资，经历了无数周折，回来，已是第二年的秋天了。那时武汉、广州早已失守，国民党虽然在表面还维持着和我们合作抗战的局面，但对我们共产党人的迫害已在一步步加紧。陕甘宁边区也实际受到了胡宗南的武装封锁。我只得把抢运回来的物资运到宝鸡藏起来，自己就在西安找了个地方住下，以便把这些物资陆续分批运到抗战圣地延安去。当时林伯渠同

志在西安办事处，他看到敌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面貌已经暴露，我们也需要有所准备，就秘密指示：要我利用还没有住进办事处，公开身份，尚不为敌人所太注意的有利条件，一面继续处理这批物资，一面设法多了解一下国民党反共的活动情况。从那时起，我就以香港灿华公司代表、西安雍懋商行老板的身份出现在西安，又开始了党的秘密活动。

到了1941年，中央指示：要我加强这方面的组织活动，并特别着重了解敌人的反共军事活动情况。因为从国民党宣布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和“皖南事变”之后，敌人接着又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好几次的军事进攻。局势愈来愈险恶。敌人既然已拿起了刀子，要公开屠杀人民，我们当然不能束手待毙。需要加强调查研究，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当中央这一指示到来后，党内个别同志自然不免有点为我担心。他们觉得我在西安活动的时间太久，认识我的人较多，可能会被敌人发现，曾建议我请求中央改派别的同志来，把我调回延安。这些同志这样想，当然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的西安，是胡匪宗南的老窝，蒋介石用以包围和准备进攻我陕甘宁边区的基地，他怎能容许我们把尖刀插在他的心窝里。在这里，不但有着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有着国民党的大量警察、宪兵和保安队，还有着专门用以对付我们共产党人的各式各样的特务组织。据我们了解，单是“中统”一个系统，就有四五千入，加上“军统”以及其他各种地方性的特务匪徒，估计至少也在两万人以上，真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了。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把党的秘密工作坚持下来，并且把工作做好，当然是有一定的危险和困难的。但我自己却另有一种想法。我年青时代就在西安上学，入党以后，从大革命时代起，革命活动的范围基本上没有脱离开西安。在这里活动的时间长，认识我的人多，确实有其不利的因素。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我在这里待得久了，对这里

的社会环境、地方情况、风俗习惯都比较熟悉，社会关系多，更容易隐蔽自己，为开辟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正是极其有利的因素，何况党所交给我的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光荣任务，我当然只有服从党的需要去坚决完成这一任务。困难是会有，但是十几年的困难都克服了，也没有吓倒过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原就是为了克服困难而存在的。所以我下定决心，留在西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而且我深信：有着党的英明领导，有着群众对我们党的拥戴爱护，只要小心谨慎，敌人是莫可如何的。最后得到党的同意，决定还是由我留在西安担负起这一艰巨的光荣任务。

× × 路 × × 号地下室

在已往长期的地下斗争活动中，我时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如何能保卫组织和工作人员的安全，躲过敌人的追捕。考虑结果，我觉得除了要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工作纪律，并绝对遵守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对敌斗争原则和各项策略，以及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利用社会关系作掩护和争取公开合法而外，最好还能有一所足以保证安全的秘密工作地下室。到了1939年，这个思想就更加具体化了。那时在西安，我的政治活动还未被敌特察觉，可是有一次，周恩来同志由延安去重庆路过西安，随他同行的赖祖烈同志，在到了火车站以后，因为有事又返回到我的住处去了一趟，这样，我的住所和我跟组织的关系也就被跟踪的特务发现了，从此敌特对我的住所开始了无日无夜的侦查活动。他们曾经通夜守在门口，先后捕去过为我做饭的孙正顺同志和我的一个表弟。只是由于当时双方的关系尚未公开破裂，因此没有进一步搜捕，被捕去的两个人，经过审问后也很快就释放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敌人怕暴露

了他们更大的阴谋，所以不能不暂时藏起狼的牙齿。这一来，也就引起了我更高的警惕。我特地在后院辟了一间简陋的暗室，最初的打算原只是便于保存党内的机密文件，但在后来敌人搜捕得更紧时，我也在里面躲藏过好几次，倒确实起了掩护作用。不过这间暗室太小，仅够容得下一个人，而且除入口外，另无出口，从长远的地下工作着想，是远不够条件的。因此我想，只要条件许可，一定得修建一座比这更理想的地下室。

不久，我的愿望真的实现了。那年冬天，和我断绝关系已久的父亲在家乡去世了。他给我遗下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财产。这笔遗产，本来我打算交给党作为活动经费的。可是林伯渠同志觉得我还有继母在世，不便处理，决定还是暂时由我保管，说必要时可以移作我的秘密活动经费。后来我就利用这笔钱从一个破落财主那里买了一座房子。这座房子恰好在一次大轰炸中被日寇飞机炸成了一片瓦砾，需要全部重建，加上那时西安家家都在修防空洞，于是我就利用这个机会，以重建房屋和修防空洞为名，开始了秘密工作地下室的兴建工程。由我亲自设计蓝图，梅永和同志担任监工，工人大半是临时由外县找来的，按图分段分期施工。每修好一段，就另换一班工人，主要工程和接口部分，则由我们亲自动手，使外人无从知道底细。这项工程从1940年秋季动工，到1943年春天才全部完成，一共用了十多万块砖，二十多吨灰沙。

地下室修建在住房的后院，离地面五点七米。里面有两个窑洞，一个用于收发电报，一个用于印刷文件，窑洞里有通向地面的天线设备，有防护机器受潮的干燥设备，有存放密码和机密文件的安全设备，还有调节空气的天窗设备。天窗就伪装在后院厨房的烟囱内，中午还可透进一丝太阳光来。此外还特意挖了两口水井，一口是明的，供传递消息和吊饭食用，通过井口，可

以随时和地面联系，一口是暗的，供大小便和销毁文件用。

地下室有三个入口和两个出口，入口分布在后院各个住人的房子里面。一遇警讯，就可以随时下到地下室。出口则通向别处的房子里。通地下室的地道很窄，只能一个人接一个人下去，不能两人并行，重要转口部分，甚至需要爬行才能通过。如万一被敌人发现，只要把先下去的第一个敌人打死，他的尸体就自然堵塞了地道，使后边的人再也无从下去。在接近窑洞入口的地方，又另有鹁子翻身设备，进到这里，须爬行进入一个小洞，翻转身躯，然后才可以到达窑洞。洞口各设有三寸多厚的榆木盖，木盖四边都钉有毡毯。上面还有近二百公斤重的青石碌碌两个，进入窑洞以后，只要盖好木盖，青石碌碌压在上面，休说人进不去，连水和毒气也无孔可入。就是敌人进行爆破，顶多不过毁了地下室，里面的机密，敌人是得不到的。至于地下室里的人，他们有通路可以随时脱身而走。

地面上掩护的房子，包括四座院落，三道大门，一个偏院，大小二十几间房子。表面看来和西安城内一般住房并无两样，但这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大门内厢房设有秘密电铃。一有动静，第一道大门内管报警讯号的同志，可以通过安装在墙壁里面的电铃告知后院，使里面的人及时进入地下室躲避。地面上的房子也和地下室一样，有专门架设秘密电台、暗藏密码、存放秘密文件和收藏自卫武器的地方。另外在院子内还有掩护工作人员白天行走的设备。因此形势比较缓和的时候，也可以在地面上进行工作。

和我们的住院相接连，还有三座院落，相互构成一个曲尺形。从地面看来，它们四宅四门，各不相关，但地下却是相互贯通，其中两座院落内就有着地下室的出口。这些房院里住的也都是党内同志或进步朋友，是和我们一道工作或是掩护我们工

作的人。

地下室建成后，党的机关就搬了进去。从此，这里不但是我们秘密工作的指挥部，而且是我们秘密电台台址，是我们地下油印刊物的印刷所。本来把这些工作部门与秘密领导机关设在一起，是不适宜的，当时也曾考虑过。但为了集中处理问题，避免过分暴露和减少联系上的困难，考虑的结果，还是这样做较为有利。可是这样一来，这里也就成了敌人集中侦查的目标。敌人当时只笼统地知道这座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穿过八路军军服、和八路军办事处有过联系的人，地下室的秘密他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在敌人的警察局里，这里已被划为“特种户口”，成了敌人警察和特务经常检查的对象。

尽管敌人百般搜查，我们却想尽办法，不让他们知道房子里到底住了多少人，更不让他们认识男主人的“庐山真面目”。虽然我们报户口时，户主的姓名是真实的，但是告诉敌人，男主人在上海做生意，是个长年不归家的人。敌人每次来查，我们只由住机关的李霜菊同志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出面应付。敌人问：“主人哪里去了。”李霜菊回答是：“到上海跑生意去了。”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敌人不在这座房子里面看到我们，就无法将我们的姓名和面貌联系起来，那么，我们一离开这所房子，即使迎面相遇，也还是无法识别我们，要想逮捕我们，等于是大海捞针。

为了蒙骗敌人，我们每隔三两个月就托人以男主人的名字从上海发个电报或寄封信来，信内无非是谈谈家常，说说他在上海做生意的情况，甚至还弄一些从上海寄来的空货箱和账单等搁在家里，装得满象有这回事。这些，最初是起过一定作用的。敌人搜到这些假信，每次都要细看，甚至还带回伪警察局研究过。后来也就不再相信了。这可能是敌人根据来信地址到上海进行过调查，知道受了骗。于是另一套花样又开始了，他们在我

们党的秘密机关对面和左邻右舍以及大马路上遍设起监视站，开设了裁缝铺、文具店和小人书摊等，另外还布置了经常监视我们的特务，化装成补鞋的、拉洋车的、收破烂的、卖油条的等等，日夜守候在大门附近，注视着从这个大门出进的人。敌人的这些措施，当然是瞒不过我们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根本不再走这个大门，而改从另一条马路上的大门出进。因此尽管敌人在门口长期守候，可是竟连我们是个什么样子，他们也无法知道，而我们依然早出晚归，自由自在的活动于西安各个大街小巷。

1946年夏季以后，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反革命内战，对延安的军事侵犯已在积极部署，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也在那年9月10日被胡宗南封闭了。胡匪为了扫清他的后院，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屠杀更加疯狂了。但是他们也知道西安还有共产党的活动，并且似乎已隐约知道我们活动中心的所在。胡匪曾经几次在反共会议上指示大小特务，说：“只要能在北城捉到一个共产党，共产党在西安城的秘密机关就不难全部破获。”这一来，敌人对我们住的地方的突击检查更加频繁了。白天来，晚上也来，有时甚至一天来两三趟。好在这时，我们早已把秘密电台转移到敌人的“剿共”司令部里面，并另添设了新的交通联络站。同时，我们采取缩小目标，争取公开，做好保密工作等办法，把机要员报务员送回延安，把一些具体的可以分散到别处进行的工作转移到另外较为安全的地方进行。由于根据中央指示，更加提高了警惕，虽然也发生过几次异常危急的情况，但由于李霜菊同志的机警、镇静，应付得当，终于化险为夷，地下室的秘密始终没有为敌人发现。直到1947年9月，敌人派了特务头子实行武装占领，进驻到我们党的秘密机关二门院内来，准备坐待机会，守捕我们，我们才不得不主动放弃了这所使用将近六、七年的地下室，搬到

另一个地方继续进行秘密战斗。但就在敌人占领以后，我们也还是在里面继续住了三天，收拾好电台，清理了文件，消灭了一切可供敌特研究的痕迹和线索，把地下室的出入口都严密堵塞了，然后满怀胜利的信心离开了这里。

沉着、机智的女主人

在敌人向我们疯狂进攻的岁月中，完全可以想象，我们除了仍然保有马克思给我们的革命的绝对自由而外，一切生活上的自由都被敌人彻底剥夺光了。在房子里，不能大声讲话、大声咳嗽，就连应该享受的听孩子喊爸爸的自由都没有。因为主人既然已“去上海做生意”，孩子们若喊爸爸，万一被敌特偷听到，就无异于向敌人告了密。至于进出娱乐场所，如听戏、看电影、逛公园、理发、洗澡等等，就更无此种权利。好在我们这时什么都不想，只是一心一意要打垮敌人，取得斗争的胜利。

在这样紧张严酷的斗争中，从机关内部说来，任务最为繁重的要数李霜菊同志了。她的工作很繁重。由于我们都不能露面，不能让敌特在机关里面发现我们，当时规定，所有一切送报、送信、送牛奶的，查电表的，收房租的，挑水的，掏粪的，收破烂的等等，都绝对不许进入党的秘密机关大门，更不用说雇用保姆、佣人了。因此机关内部的一切事务、包括生活上的一切问题，差不多全靠她一个人来安排管理。而最为艰巨的还是应付敌人突然而来的检查。

李霜菊同志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最初参加党的工作时，还不免有些紧张，如她自己所说，一听到敌人敲门，心就不由得怦怦跳。但经过常年的斗争生活以后，她变得越来越坚强、沉着，也越来越善于随机应变、应付敌人了。

在党的秘密机关尚未搬到新的住所的前一年，有一次，我们

的老交通员吴育坤同志由延安跋涉而来，到的时间已经很晚，进来时又没人看见，我们只好要他在机关暂住一晚。不料他刚睡下不久，外面就有人敲门，准又是宪警来查户口了。我连忙把他带来的秘密文件和中央的指示收藏好，躲入了暗室，留下李霜菊同志出面应付。李霜菊同志一打开门，敌人就蜂拥而入，气势汹汹，逼着她问，“你家有几口人？”

李霜菊同志不慌不忙地说：“他外爷爷今天从乡下来看外孙孙，刚才睡下。因为晚上到，我正准备明早去报户口，家里就多了他一个。”

敌人以为这一下可抓住把柄了，两个警察端着枪马上向后房冲去。李霜菊同志怕吴育坤同志一时忘记了预先商定好的应付办法，说话对不上口径，露出马脚，她立刻抢上前去，把门一拍，喊道：“大！大！（陕西东府一带呼父亲为大）警察来查户口了。”声调是那样平缓、自然，吴育坤同志一听，心里也就有了主意。他翻身起来，衣服半掩半披，打着哈欠，刚一开门，敌人也不等他和李霜菊同志搭话，就用枪逼着问，“你从哪里来？”

“我从乡下来。”吴答。

“来干什么？”

“我两个外孙孙都好几年没有看见了，来看看他们。”吴育坤同志满脸绉纹，皓首白须，长满粗茧的双手和一身粗布衣服，土里土气，确是农民本色，并且态度自然，一点也没有令人可疑之处。

“你女婿呢？”敌人进一步追问。

“只听说他在上海做生意，也好几年没有看见了。我这次来也正想看看他。”

“骗人！你女婿就在八路军办事处。”

“这个我就知道了。我只听说他在上海。”



“走！跟我们到警察局去。”敌人看到再也问不出漏洞来，开始露出真面目来了。

“怎么？外公来看外孙孙，还犯法吗？”吴问。

敌人是有目的而来的，怎能听他分辨呢！最后还是把他带走了。

在警察局，敌人一直把他当乡巴佬，对他进行诱骗。敌人说：“你的女婿在八路军办事处。”吴育坤同志始终坚持说是在上海。

敌人说：“她说在上海是骗你的。明明有人看见过他在八路军办事处。你不是也想看看你的女婿吗？明天你只要到八路军办事处门口一叫，他就会出来，他一出来你也就没事了。”吴见一时摆不脱敌人，也就顺口答应了，心里却另有了主意。

第二天一早，敌人满怀希望，带着吴育坤同志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对面空地上，着他去办事处喊我。敌人带着照相机和望远镜，对好镜头，准备只等我一出来看准面貌，就给我拍下照片。没有想到吴育坤同志到了大门口，竟昂然走进办事处去了。敌人在外面等了老半天也不见他出来，想进去搜罢，当时还维持着合作抗战的局面，他们又无此权利，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一无所获。等到天黑以后，吴育坤同志化了装，瞧着外面再也没人监视，就悄悄溜出后门，径奔车站，搭上火车走了。

这还只是对敌正面展开斗争的开始。等到后来，这样的场合就越来越多了。在我们搬到新的秘密机关以后，有两次，秘密电台正在地面上的房子里发电报，就碰到敌人来检查。前面说过，我们那座房子有三个院落，三道大门，纵深有六十米，敌人要通过三道大门进到后院，至少也得三、五分钟；而我们，不要一两分钟就可以安全走进地下室，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偏偏逢到电台设在地面上，要拆电台，拆天线，还得检查

和消灭一切可以引起敌人注意的痕迹，这样，时间就显得匆促了些。等我们刚收拾好电台，还来不及把安装电台的地方复原，敌人已经在第三道大门上砰砰敲门了。迟迟不开是不行的，开吧，电台很可能被发现。时间，时间！这时对我们来说，时间是最宝贵的了。可就在这时，我听到李霜菊同志叭哒叭哒地拖着拖鞋，嘴里连连嚷着“来了！来了！”一直走向大门。可是她没有立即开门，只把锁拧了一下，嘴里又连忙嚷着：“啊！忘记带钥匙了。对不起，请等一等，我拿钥匙去。”最后，门开了，我们也早已收拾完毕，安然进入地下室了。敌人搜索的结果，当然什么也没得到。

最危险的一次，还要算 1946 年夏季的一天。那天天气非常闷热，坐在房子里就象浑身浸在热水里一样。吃过中饭，我想洗一个澡，舒祛一下身体的疲劳；因为晚间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给延安的电报还没有发出，下午还要出去收集情报。敌人在上午已来查过一次，估计中午是不会再来了的，于是我打来一大桶水，就在上房门背后洗起澡来了。不料洗到一半，从门缝里透过竹帘望去，只见人影直晃，一个警官带领着两名警察已经通过二门进到后院来了。事情来得这样突然，门口管警讯的同志大约是有事出去了，也没有按电铃。怎么办呢？人当然可以躲进地下室去，可是澡盆和地下的水渍怎么收拾？

就在这一瞬间，我刚穿上衣服，李霜菊同志已经一步从内室跨了出来，有些生气地嚷道：

“我在洗澡，不要进来！”这声音简直就象在对敌人下命令。敌人倒也很听话，就在靠门三尺左右的地方停下来了。

我当时也怔了一下，怎么是她在洗澡呢？当然，我很快就明白了她的意思。这时只见她把上衣的纽扣一解，迅速扒下脚上的鞋袜，把脚往水里一浸，换上一双拖鞋，接着就拖过自己的孩

子来，帮她脱光衣服，推她坐在澡盆里，这才一面装做扣衣服，一面走去开门。这个当儿，她一回头，发现我的一双鞋子还丢在那里，又连忙回来，把澡盆的一边略微抬起，把鞋子塞在澡盆底下。经过这一周折，我当然也就很从容地进入地下室去了。

敌人一进来，劈面就汹汹地问：

“你男人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回来。”

“你为什么这样久不开门？”

“我不是告诉了你们，我正在洗澡。”

敌人望望澡盆，孩子正在水里玩得欢着呢！敌人无话可说了。

“搜！”敌警官一声令下，两名伪警很快地闯进各个房间，翻腾起来。可是翻腾结果，除了从书桌抽屉里得来一封男主人从上海寄到的平安家书而外，仍是什么也没得到。而这样的家书，敌人至少已见过十多封，对它再也没有兴趣了。

敌人临走时说的话几乎是例行的：

“你男人一回来就要他到局里来一趟！”

“是！他一回来就一定叫他去。”女主人的回答也是例行的。

就这样，在和敌人捉迷藏式的战斗中，多少年来，我们从没有让敌人在机关内部看到过我们任何同志的（除李霜菊同志外）身影面貌；除了专为迷惑敌人而准备的假信、假账单等而外，也从没有让敌人得到过可供研究线索用的片纸只字。

我们生活在群众中间

毛主席说过：“我们是鱼，群众是水。”在这些艰苦的斗争年月里，我们所体验到的就正是这样。不少进步群众总是紧紧地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掩护着我们，主动地积极地协助我们工作和